

山东大学“211工程”重点立项

中国文学精神

主编 郭延礼

CHONGGUOWENXUEJINGSHEN

【先秦卷】

王培元 廖群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精神·先秦卷／王培元，廖群著．—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ISBN 7-5328-4174-X

I. 中… II. ①王… ②廖… III. 文学史—
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5238 号

中国文学精神

(先秦卷)

郭延礼 主编

王培元 廖群著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0531)2092663 传真：(0531)2092661

网 址：<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规 格：880mm×1230mm 32 开本

印 张：10.75 印张

插 页：5 插页

字 数：251 千字

书 号：ISBN 7-5328-4174-X

定 价：16.2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郭延礼

在探讨中国文学精神之前,首先必须对“精神”一词做点探原的工作。

精神,从一般哲学意义上来讲,是同物质相对应、和意识相一致的哲学范畴,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的心理状态。唯物主义者常把它和意识作为同一意义的概念来使用,认为它是物质运动的最高产物。在古代哲学中,“精神”一词是有变化的,对它的理解也并非完全一致。有的哲学家把精神理解为精气、元神;也有的指心神、神志;也有的指人的意识;也有的作为实质、本质、主旨的同义语。宋代王安石的《读史》云:“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我们的理解偏重于后者。但对精神作为“意识”的内涵我们也给予充分的关注。

那末什么是文学精神呢?文学精神就是以文学为载体,从中抽绎出来的有关文学的观念、思想意蕴、审美理想、人文精神、价值取

向、文体风范,以及创造主体所体现的人生态度、人生追求、人格力量和艺术创造力。

如所周知,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的反映;政治、法权、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①;但,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文学,它又有其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存在着“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②,因此文学艺术的发展并不完全由经济发展决定。在阐述文学精神时,我们必须看到文学自身的特殊性,而不能把它简单地视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文学的继承性,在传统文化中又有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的共同的東西,如文学中的爱国主义、忧患意识、对英雄豪杰的崇拜,以及文学中普遍认同的美。文学中所呈现出来的这些方面,经过历史的积淀,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它们应当是文学精神中的重要内容。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阶段,由于政治、经济条件的不同,思想文化背景的差异,各个时代所体现出来的文学精神不尽相同,这又构成文学精神的时代特色。每个时代中,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由于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美学追求和人生态度的不同,在文学创作中所表现的文学精神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因此在探讨文学精神时,既要承认它作为全民族精神财富的共同性,又要看到其时代差异,还应当重视其个性特色。总之,文学精神的内涵是丰富多彩、饶富哲理和人生趣味的,既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风范,又具有创造主体的自我精神风貌和个性特点。诚如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说:人们的精神活动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它较之‘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

① 恩格斯:《致亨·施塔尔肯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二),第505页,人民出版社,1962。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95。

尽的丰富宝藏”具有更多不同的色彩^①。

—

文学中所体现的时代精神。

时代精神，是指一个时代的主导精神。时代精神并非只是单一的一种，它应当是多元的。但，每个时代总有一种最具有标志性的精神。比如两汉的大汉精神，唐代的盛唐气象，宋代的理学精神，近代的后蒙精神。我们姑且以盛唐气象为例剖析文学中时代精神的体现。

在唐代文学中最突出的表征就是盛唐气象。盛唐气象，这是林庚先生上世纪 50 年代所提出的一个文学史概念。盛唐气象正如同大汉精神一样，首先是时代的产物。林庚先生说：“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这时代性格是不能离开了那个时代而存在的。盛唐气象因此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②如所周知，盛唐时代（主要指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正如杜甫在《忆昔二首》中所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此时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家统一，政治开明，这种安定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唐代的国力达到顶峰。与此相适应，在文学上，特别是诗歌中呈现出一种博大、雄浑、豪放的气象和风格。诗人高度的政治热情，渴求建功立业的壮志，积极进取的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7 页，人民出版社，1956。

② 林庚：《盛唐气象》，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58 年第 2 期。此据作者的《唐代综论》第 2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生态度，处处透露出一种昂扬奋发的精神力量。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韵》）；“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凤凰台》），李白的“叱咤经百战，匈奴尽奔逃”（《白马篇》）；“横行负勇气，一战静妖氛”（《塞下曲》）其六；“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都透出一种昂扬奋发的豪壮之气。即使在生死未卜的征战前夕，诗人笔下的塞外战士仍展现出一种豪迈欢乐的精神状态：“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诗人作品中这种渴求建功立业的报国热情和昂扬奋发的人生追求，正是大唐帝国国力强盛、欣欣向荣的现实反映，这就是盛唐气象。

盛唐诗人具有博大的胸怀与宏伟的气魄，当他们对客观事物进行审美观照时，出现在诗人笔下的自然景观总是雄伟磅礴、气象万千。“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王昌龄：《从军行》）“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不论是写湖泊的水势，还是塞上的烽火，也不论是写青海的雪山，还是西域的风沙乱石，都写得气势峥嵘，意境奇丽多彩，令人惊奇叹绝。即使是气候多变，雪后奇寒，也写得那样的壮丽多姿，富有生机，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特别是李白诗中有关祖国河山和大自然景色的描写，更显现出一种雄伟壮丽、奔腾飞跃的景象，那“咆哮万里触龙门”“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的黄河，那“连峰去天不盈尺”“百步九折萦岩峦”（《蜀道难》）的蜀道，那“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的庐山瀑布，还有那“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

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天台山,都写得宏伟壮阔,气势非凡。他运用惊人的想象和极度夸张组合而成的壮美奇丽的意象,颇有一种崇高美。这种吞吐宇宙的气势,使他笔下的自然景物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抒情主体生活激情的喷射,恢宏气度的再现。

盛唐气象表现在美学风格上是雄浑、豪放,充满着绚丽的奇光异彩。王昌龄的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气势磅礴,雄伟壮丽,曾被杨用修、王世贞等人誉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在美学风格上呈现出雄浑之美。至于高适的边塞诗,像《燕歌行》《塞下曲》《塞上》《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等更是雄浑之作的代表。明代胡应麟在比较李白与高适的诗歌时说:“然高虽浑厚易到,李则超逸入神。”(《诗薮》内编卷四)他又在论七言绝句时,直接指出“高适之雄浑”(《诗薮》内编卷六)。李白的诗,豪迈奔放,叱咤风云,气壮山河,横扫千军,可谓登唐诗豪放之颠峰。杜甫称他的诗“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李白的诗歌是那个疆域开阔、国强民富、蒸蒸日上的大唐帝国的产物。

盛唐气象不仅表现在唐诗上,其他艺术无不呈现出一种气势磅礴、狂荡不羁、自由奔放的特点,如草圣张旭笔势恣肆放纵,连绵回绕,跌宕多姿,开创了草书艺术的新天地。《新唐书·张旭传》云:“(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唐代诗人李颀赞他的草书云:“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赠张旭》)与张旭相辉映的怀素,也是一位善草书的书法家,其时有“颠张醉素”之称。他的草书在师法张旭的基础上又有所变化,别具洞天。《宣和书谱》谓其草书“字字飞动,圆转之妙,宛若有神”。

再如颜真卿的书法艺术,吴道子的绘画,曹霸、韩干的画马,公孙

大娘的剑器舞,都给人一种兀傲狂放、神奇非凡的感受。当然,盛唐气象作为时代精神它还有博大宏伟、浑厚海涵的意蕴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但仅从如上所谈即呈现了盛唐气象所具有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精神风貌。

二

文学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本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另一指称。人文主义,是借用拉丁文的 Humanitas,英文写作 Humanism,意思是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等。人文主义作为当时进步的社会文化思潮,是在与封建势力、教会和神学斗争中产生的。它所倡导的文化精神在我国古代文学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中国古典文学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人文精神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其内容不同于欧洲的人文主义,但其精神是相通的,如人生关注、人道主义、忧患意识、民主精神、个性解放等等。

人文精神从本体意义上来讲,它是以关注人为前提的,其核心内容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生存意义、人生价值、人类命运的思考和关注。这方面有些内容比较抽象,是属于哲学层面的。比如庄子为了寻求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在‘诗与哲学’中间寻求精神解脱,追求诗化人生。庄子最早注意到人与社会的内在矛盾和社会文明对人的异化。因此他所关注的是人类精神的苦闷以及如何解脱这种苦闷。庄子知道个体的人对于社会的压抑是难以抗拒的,也无力摆脱社会的黑暗和恶势力,故他以返归自然为理论基点,转而寻求一种绝对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境界。他的《逍遥游》就是描写一种使精神脱离尘世的境界,即作者力图从主观上摆脱现实的制约,以达到精神上的思接千

载、与道合一的遨游,寻求一种绝对自由的思想空间。当然,庄子所寻求的这种诗化人生^①,以及绝对的独立自由和心灵的解放,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这种美好的带有终极意义的理想和执着的追求值得肯定,他对人类生存状态、人类生命的思考和探求也是有意义的。

再如王国维,他也看到了人生苦痛并寻求解脱之道。他在《〈红楼梦〉评论》中探讨了人生痛苦起源于“生活之欲”(叔本华语)。王氏说:“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又是处于永无满足之中,人就永远居于“苦痛”之中,一种欲念得到满足,无数欲念又随之而起。欲不得偿,固然是痛苦,即使全部得偿,人又会立刻陷入空虚之中。生活本质是欲,欲就是苦痛,故欲、生活、苦痛,三者是互相关连、密不可分的。那么在充满“欲”和“苦痛”的“生活”中,怎样才能得到“解脱”呢?他认为只有艺术。因为在王国维看来,世间一切事物,都与人有利害关系,也就是说,都与“苦痛”相连,只有艺术才可以摆脱物与我的利害关系,只有艺术才可以解脱人生的苦痛。他又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是示人生以解脱苦痛之道的。王国维根据叔本华的理论认为《红楼梦》一书是作者“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理解未必完全正确,但他这种对人生痛苦及其解脱之道的探索还是有意义的,它也带有终极关怀的性质。

不畏强暴,坚持人的尊严,歌颂人高洁的情操,礼赞崇高的人格力量,也是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

肯定人的尊严,人的高贵,本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的主要内涵。他们认为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并从人的价值来肯定人的尊严,赞美人的人格力量。这种人文资源在中国古代文学典籍

^①关于庄子的“诗化人生”,参用了赵明先生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中的意见(见该书的第840~841页),谨在此说明并致谢。

中并不乏见。从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大人先生传》），到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从陆游的‘丈夫贵不挠，成败何足论’（《入瞿唐登白帝庙》），到陈确的“一身如可赎，万死又何辞”（《又咏》）；从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狱中题壁》），到章太炎的‘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不挠’（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类坚贞的品格、高尚的情操、崇高的气节，都表现了作为‘中国的脊梁’的知识精英的人格力量。

咏物诗，大多是借物喻人或托物言志，从而寄寓、抒发作者自己的人生感受和生活（政治、道德）理想的，往往诗中所咏客体正是抒情主体形象的自我写照。在古典咏物诗中，通过咏梅、咏兰、咏菊、咏竹等客体，赞美人的品德、情操，这类作品也蕴寓着丰富的人文精神。比如善画竹的郑板桥有《题竹石画》，诗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以竹扎根于青山、生长于岩石的缝隙中，任什么风都吹不倒，经得住“千磨万击”，喻抒情主体坚贞的品格。秋瑾的《梅》十章之一：“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琼楼傍古岑。标格原因独立好，肯教富贵负初心。”以赞美梅花来喻诗人超脱世俗的独立的人格力量。于谦有一首《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以咏石灰寄托自己为国家不怕粉身碎骨、“要留清白在人间”的高尚情操。这类诗词在古典文学中甚多，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

忧患意识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一个优良传统。“忧患意识”说是徐复观先生 1962 年在《中国人性论史》中提出的，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中又曾加以阐述，他们认为中国人的人文精神躁动于殷周之际，而人文精神的基本动力就是忧患意识^①。

^①参见庞朴：《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载《二十一世纪》1991 年第 6 期。

“忧患”一词始于《易经》。《易·系辞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孟子·告子下》：“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忧患意识是一种道德意识，它强调个体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恰恰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主体意识的一种表现。诸如“岂余心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屈原：《离骚》）；“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忧端齐终南，湏臾不可掇”（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都是忧国忧民的著名诗句。宋代以后，随着民族矛盾的日趋严重，一些爱国志士更是无时不为国家担忧。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抒发了自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患情怀，并要求自己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又赋予忧患意识更高的思想境界。苏洵说：“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管仲论》）诗人陆游说：“位卑不敢忘忧国。”（《病起书怀》）文天祥，这位置生死于度外的爱国者，更关注的是百姓的温饱：“但愿天下人，家家足稻粮；我命浑小事，我死庸何伤。”（《五月十七夜大雨歌》）他们为国事担忧，关注民生疾苦，而置个人忧乐、安危、生死于不顾，正所谓“为世忧乐者，君子之志也”（荀悦：《申鉴·杂言上》）。因此他们又具有不畏险途、自我牺牲的精神：“安得普天免冻馁？白头蹇拙甘送穷”（陈维崧：《二日雪不止》）；“揭云直欲上天门，首为苍生讼风伯”（陈东：《大雪与同舍生饮太学初筵斋》），这种高尚的情操是古代士大夫中仁人志士的一种生活追求和人生理想，自然是忧患意识的重要内涵。

忧患意识在近代作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1840年后，随着殖民主义者的入侵，祖国危亡日深，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更加严重，已面临着被资本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谭嗣同的《有感一章》真实地抒发了中国知识界对民族危亡的忧虑和对祖国前途的关切。诗云：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此外,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康有为、梁启超、柳亚子、陈去病、秋瑾等近代作家均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在这方面,龚自珍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在龚自珍作品中,经常出现‘忧患’一词,他有《赋忧患》一诗,把忧患人格化了。他说:“故物人寰少,犹蒙忧患俱。春深恒作伴,宵梦亦先驱。不逐年华改,难同逝水徂。多情谁似汝?未忍托禳巫。”龚自珍把‘忧患’看成与自己‘作伴’,是自己的‘先驱’,称它‘多情谁似汝’;另诗中又称‘忧患吾故物,明月吾故人’(《寒月吟》),俱见出诗人‘忧患’意识之深。在《西郊落花歌》中他更把忧患与自己的身世联系起来:“又如先生平生之忧患,恍惚怪诞百出难穷期。”在他的其他诗中还有多处提到‘忧患’。龚诗中多次出现‘忧患’,并非偶然,正是诗人强烈的忧患意识的表现。龚自珍生活的年代,正值清王朝日趋没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时代,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情况下,‘大忧’‘大患’‘大恨’的字眼,多次出现在龚自珍的笔下,他曾题其居为‘积思之门’,书其室为‘寡欢之府’,名其凭(屏)为“多愤之本”(《与江居士笺》),足见其思虑之多,忧患之重,悲愤之深。但这种忧患、悲愤绝不只是诗人个人生活的失意与不满,而是具有深刻的时代内容和思想意义:它是诗人忧时忧国的真实写照,是诗人愤慨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同情民间疾苦的直接反映,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和爱国主义者所流露的难言之恫。而这一切,就是龚自珍忧患意识的具体内涵。

三

中国文学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前面已提到,不同历史时期各有其独具光彩的文学精神和文学现象(如‘大汉精神’‘盛唐气象’‘后蒙精神’等),但有些精神是带有普遍意义而共存于不同时代的,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爱国主义。爱

国主义像一条红线贯穿着全部中国文学，是各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爱国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自然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人们与自己祖国的一种精神维系的客观反映。列宁说过：“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①。这种感情是人们心灵中一种最崇高、最真挚的感情。正是这种感情培育与造就了历史上无数爱国的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也正是这种感情，呼唤与激励着他们为祖国赴汤蹈火而在所不辞，或英勇顽强而奋斗终生。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爱国主义传统是源远流长的，从《诗经》中的“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敌忾之气到屈原的爱国诗篇《离骚》，从杜甫的“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到辛弃疾的爱国词章，从张煌言的“山河纵破人犹在，试把兴亡细较量”（《书怀》）到秋瑾的“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均洋溢着浓郁的爱国主义激情。以上仅是举例。其实，爱国主义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它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和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是一宗珍贵的精神遗产，需要我们从各个侧面进行阐述。

1. 古代爱国主义往往和‘民族’‘国家’相联系。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它有不同的历史内容和特点，在古代它往往和民族相联系。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②。民族，也是一个历史范畴，虽然它是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必然产物与必然形式，但在资本主义时代前民族的要素已经形成。比如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169页，人民出版社，1985。

② 《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49页，人民出版社，1953。

不断融合的大集体,其主要成员华夏族(亦作“诸夏”),即后来的汉族,它当时居住在中原一带,生产技术和文化水平都比居住在周代境内的其他民族如山戎、犬戎、白狄、赤狄、戎蛮子、东夷等要先进一些。在历史的长河中,华夏族也逐渐融合其他民族,到秦汉时逐渐形成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但和今天的中华民族还不能等同。

国家这个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国”这个词出现较早。

《易经·系辞下》:“君子安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孟子·离娄上》:“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古代以诸侯的封地称“国”,以大夫的封地为“家”,后国家合用,即“国”的通称。在古代,国家的概念和我们今天的概念是不同的。但“爱国主义”一词又是与国家相联系的。由于古代“国家”的概念和近代意义的“国家”概念不同,我们不可能要求古人所爱的国就是今天意义上的中国。比如屈原所爱的楚国,诸葛亮所尽忠的蜀国,李煜词中的故国之思“四十年来家国”,都是以一个民族(部族)、一个地区或一个割据的小国为中心的“国家”。但我们仍然承认屈原、诸葛亮、李煜等人所抒发的爱国情感或亡国之痛,而不能用今天的爱国主义标准要求古人。

2. 爱国主义文学的丰碑多出现于国家危机存亡之秋。

前已说过,文学中的爱国主义像一条红线贯穿着全部中国文学,但爱国主义文学往往多出现于民族矛盾尖锐、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就中国古典文学史来说,南宋时期、明末清初和近代是三个重要的时期。北宋末年,女真贵族所建立的金政权日渐强大,并占领了北中国广大地区,给北宋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南宋初期,金兵南侵,进一步威胁着中国的统一和南方的安全。此时,在朝在野的有识之士纷纷要求抗金,他们中有人以诗词为武器,支持抗金主张,颂扬抗金将领,于是在文坛上掀起了一个爱国主义创作高潮,涌现了以辛弃疾

疾、陈亮、刘克庄、刘辰翁为代表的爱国词人，以陆游、范成大为代表的爱国诗人。南宋末年，更出现了以文天祥为代表的一批爱国诗人，他们之中有汪元量、谢翱、郑思肖、林景熙等人。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至今仍给人以巨大的精神鼓舞。

明末清初，由于满洲贵族的入侵，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更加尖锐，爱国文社和爱国文学应运而生，复社和几社在当时就影响很大。在反清斗争中，又涌现了像陈子龙、夏完淳、瞿式耜、张煌言等爱国诗人。清初，又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他们既是思想家，也是文学家，写了许多爱国诗篇，《海上》四首、《山居杂咏》《杂诗四首》是传诵一时的爱国诗作。此外在明末遗民中以诗著名者还有杜濬、归庄、吴嘉纪、屈大均等人，他们的作品都抒发了怀念故国的深厚感情。特别是屈大均，反清思想特别强烈，他的诗歌《旧京感怀》《壬戌清明作》《鲁连台》、以及词《长亭怨·与李天生冬夜宿雁门关》《念奴娇·秣陵吊古》等，通过赞颂英雄人物或怀古，寄托自己的爱国情思。

降至近代，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历史内容。此时民族矛盾中的“民族”，已具有了近代意义，即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这是过去所未有的。张维屏的《书愤》诗云：

汉有匈奴患，唐怀突厥忧。界虽严异域，地实接神州。渺矣鲸波远，居然免窟谋。鲋生惟痛愤，洒涕向江流。

张维屏从中华民族这一整体观念出发，正确指出匈奴、突厥虽曾为汉、唐之患，但它们仍是中国境内的兄弟民族，所谓“往者蛮夷长，依然中国人”（《松心诗集·越台》），而今天侵略中国的却是远隔重洋的英国殖民者。这种认识表现了作者民族意识的新观念。连地处天末的贵州布依族诗人莫友芝也说：“卧榻事殊南越远，可容鳞介溷冠裳”（《邵亭诗钞·有感两首（海腥吹入汉宫墙）》）。他说，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远非古代南唐、朱崖可比。南唐是本民族的事，朱崖当时虽系

“蛮夷”，但和英、法等外国侵略者是不同的。’这两位分处鸦片战争前线和后方的诗人均一致指出：近代以反帝反殖为主要内容的反侵略战争，是和古代中国境内诸民族间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战争具有不同的内涵。这种观念上的变化，正反映了近代文学家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萌生和强化。

3. 古代的爱国主义往往与忠君联系在一起。

早在先秦时代，《公羊传·庄公四年》即云：“国、君一也”。古代的君主，就是国家的象征。这在古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杜甫、辛弃疾和陆游等人的作品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是因为在古代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如安史之乱时的唐代、南宋和明末清初），社稷（国家）、民族、皇帝往往被视为三位一体。在这时，皇帝也就成了民族和国家的代表，成了号召人民团结对外的一面旗帜。又由于古代作家的政治思想还受着长期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总是把爱国和忠君联系起来，把国家看成一姓之天下。如陆游的“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剑南诗稿·金错刀行》），辛弃疾的“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稼轩词·破阵子·掷地刘郎玉斗》），郑成功的“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出师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都表现了这种观念。古典爱国诗词中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4. 近代爱国主义与古代爱国主义意蕴的不同。

首先，古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就其实质讲，基本上还是属于中华民族长期融合、发展、形成过程中掠夺与反掠夺、压迫与反压迫的性质，它有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长期形成的这一历史事实不能抹煞。否则，古代爱国主义便无从谈起。但如从近代国家多民族这一新的角度来考察，它基本上还是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内部矛盾。1840年之后，近代爱国主义文学的基本主题是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世界殖民主义列强的侵略，

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是过去所未有的。

其次，前已说过，古代爱国主义总是和忠君联系在一起的。近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则不同。近代作家总是把批判君权、反封建专制与爱国联系起来。谭嗣同就曾十分敏锐地指出：封建君主把“国”与“民”分为二，视国家为自己“囊橐中之私产”，而把人民视为“犬马土芥”。“民既摈斥于国外，又安得少有爱国之忧”^①。谭嗣同认为人民之所以缺乏爱国心，正是因为封建君主把社稷（国家）据为己有。这种认识是十分有见地的。他还指出古代爱国者“忠君”的局限：“君为独夫民贼，而犹以君事之，是辅桀也，是助纣也。”“呜呼，三代以下之忠臣，其不为辅桀助纣者几希！”^②把“忠君”和“助纣为虐”相提并论，在古代思想家和文学家中，恐怕还少有人提出这样激烈的言论，而谭嗣同能把“爱国”与“忠君”区别开来，并明确批判了忠君思想的余毒，是极有胆识的。所以在近代文学中，爱国主义被提高到一个新的思想高度，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

四

社会变革、哲学思想、文化思潮（如先秦的理性精神、魏晋的玄学、唐代的佛教、宋元市民阶层的兴起），这些对当时的文学均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并铸造与重塑了它们那个时代的文学精神。

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文学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同时，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文化思潮，对文学也会产生影响，这便使每个时代的文学精神呈现出绚丽多彩的一面。比如魏晋玄学的出现对文学就有一定的影

①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41页，中华书局，1981。

②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40页。